

困惑中的孤寂与选择里的救赎*

——论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國]邱 艳**·涂 鸿***

目 录

- 1、存在的焦虑与自我选择的自由
- 2、生命的孤独与对死亡的超越
- 3、对悲剧的重新发现与对现实的彻底否定

西方的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 首先是由19世纪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1813-1855) 确立, 他首先奠定了宗教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因其著述中较早地谈论到“生存”概念, 并对生存中的诸多情绪、情感体验, 比如“焦虑”、“绝望”等做过细致精微的心理学的观察和哲学的思考, 因而克尔凯郭尔被奉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随后在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 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系统地创立了“存在本体论”哲学, 宣称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也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本。19世纪30年代中期, 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加布马塞尔 (Gabriel Marcel, 1889-1973) 创立了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现象学, 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二战后, 萨特 (Jean-paul Sarte, 1905-1980)、玻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

* 西南民族大学2009年度社科重点项目“独语与对话中的中国西部地域文学”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号: 09SZD004

** 四川南充(637002),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师。qiuyan430@yahoo.com.cn

*** 四川成都(610041),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院 教授, 硕士生导师。tuhongk@yahoo.com.cn

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等人以前人们的一些理论为基础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体系。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即“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即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然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因此,存在主义首先就让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主义者提出人的“自由意志”的两大敌对力量就是自然界和社会。自然界是冷酷的,充满敌意的,处处和人作对。冬天寒风凛冽,夏天骄阳似火,暴风骤雨,地震山崩,雷电水火,毒蛇猛兽,无一不在威胁人的生存。人为了生存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抗自然,因而形成了社会。但社会一旦形成,却又成了压迫个人存在的敌对力量。因为人类为了生存,就必然需要互相斗争,尔虞我诈,明抢暗偷,都是理所当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绝对的,和好相处只是暂时的现象,是培育新的矛盾冲突的温床。总之,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存在”是一种精神痛苦,人就是一个充满多态心理的痛苦主体,人只能在这个苦闷世界的底层窒息,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人一旦为了求得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而屈从于社会的压力,他就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个性。所以存在主义对人的处境的“探究”实际上是它的人生观、道德观、社会观。根据这样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观,存在主义自然就会得出人生是荒谬的、痛苦的结论,而惟一的出路就是在活着的时候鄙视人生、鄙视权威、鄙视一切,做一个惟我独尊的精神叛逆的“英雄”,同时要大胆地面对死亡,透彻地把握人从存在到不存在的必然过程,在死亡中完成自我创造。存在主义的这种人生态度,构成了所谓“现代人”的精神面貌: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在一个无意义的荒谬的世界里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导致更严重的痛苦、孤独和绝望,从而走向宗教,走向神秘,在一个孤独的封闭的世界里求得精神上的归宿,这是现代人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又肯定人的存在价值,认为存在有改善的可能性,关键是要作出“选择”,并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积极的。萨特把上帝、神、命运从他的哲学中驱逐出去,他规定了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

关键是要作出“选择”，并付诸行动，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以人为中心，号召人们 在无法改变的情境下，通过自由选择不断创造自己的存在，承担自由的重负，对自己、对整个世界承担责任。所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乐观的，关于行动的学说。

存在主义学是以存在主义哲学家为思想基础，是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它于20世纪3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欧美各国，并影响到东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西方异域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汉语文学的创作，而且也对相对较为封闭并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形态和存在状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产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以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梅卓、意西泽仁、色波；回族作家张承志、霍达、石舒清；彝族作家龙志毅、陇山、巴久乌嘎、阿蕾、时长日黑；苗族作家向本贵、吴恩泽、覃志扬、赵朝龙、石定、第代作冬；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满都麦、敖·奇达那日、阿云嘎；土家族作家蔡测海、苦金、陈川等为代表的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在具有本民族浓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照下，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接受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成为了他们文学创作一个独特的艺术视域。并且他们与那种相对于多数汉族作家而言，更加贴近自然，贴近生命本真的创作心理相交融，形成了他们文学创作中一种十分独特的艺术传达方式。

一、存在的焦虑与自我选择的自由

存在主义的思想核心往往被研究者们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是荒谬的”思想，认为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生是悲剧性的；另一方面是“存在先于本质”论和“自由选择”论，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这种思想强调人在“恶心”的现实面前进行“自由选择”以实现自己“本质”，即所谓“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的

思想。这对当时处在迷惘、苦闷以至沉沦的西方社会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救赎。若从中国当代社会变化来看，“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迅速唤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但不久，当生活前进的步伐受到种种习惯势力的阻挠甚至一时走不出历史循环的荒诞“怪圈”时，人们热望的情绪开始变得沉重与茫然。这种情绪使一部分作家在思考阻碍社会前进的原因时，把注意力投向了文化寻根，但一味的“寻根”导致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现实的疏离。于是又有一部分作家以更关心人的现存境况为创作意旨，把疏离现实的寻根趋向拉回到对人的生存现实的关照。不过，由于这是在沉重气氛下的现实关照，因此，作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中那些愚昧、落后的沉积，有意去展露那些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这种创作意向和情绪，也就很自然地与存在主义获得某种沟通。更况且作为年青一代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除了面临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外，还有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嬗变与衰亡，尤其是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意西泽仁、色波；回族作家张承志、霍达、郝文波、石舒清；彝族作家苏晓星、巴久乌嘎、阿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壮族的凡一平、李冯；佤族的鬼子等人）曾系统关注并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存在主义）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或多或少要带上存在主义文学影响的印痕。

如扎西达娃、阿来、色波这些藏族作家们在有意无意将自己内心的困惑传染给了其笔下的人物。在扎西达娃早期代表作《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里的主人公塔贝将奥运会的电波当作神的声音时，扎西达娃似乎想营造一种荒诞感，然而，他又矛盾重重，难以在情感上接受这一现实的存在。

我放下贝塔，跪在他身边，为他整理着破烂的衣衫，将他的身体摆成一个弓形，由于我右手上的血粘在了他衣衫上，这使我感到内疚。是我害了他？也许，这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将我其他的主人公引向死亡之路。是该好好反省一番了。

于是作者终于跳出来，自己走入笔下人物的世界中，站在莲花生的掌纹时牵

着匆匆赶来的继续寻找香巴拉的旅程。作家对这篇小说的建构，其实反映的是扎西达娃自身的分裂与冲突。一个是受着现代理性熏陶的扎西达娃，在表现具有神秘色彩的西藏时，很容易发现其中的“荒诞”，所以他用奥运会的电波讽刺了塔贝的执着。而另一个生长于西藏的扎西达娃，则沐浴着藏传佛教的神秘，时时觉察到这一简单对照的牵强，感觉到藏文化的巨大高远与神秘莫测，这又迫使他把自己滞留在甲村的，带入了寻找香巴拉的旅程。^[1]现代理性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徘徊于作家心间，困惑的扎西达娃面对现实（存在）只能将自己安排在不断寻求的路上。在扎西达娃后来的创作中，无论是《泛音》中的次巴或《风马之耀》中的乌金，他们或在寻找“先祖的声音”，或在寻找仇人“索朗仁增”，扎西达娃都把他们永远悬置在寻找的路上，纠缠于作家心灵的困惑难以化解，存在的焦虑使自我在选择中迷失，由此我们可以体悟到他们心灵深处所体悟的存在的困惑与焦虑。

还有藏族作家梅卓以她那凝重而幽邃的情怀构筑了一道醒目而奇绝的风景，她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传递了青海藏族部落历史行进的足音。她笔下的人物如《太阳部落》中的索白、阿·格班、耶喜、万玛措，《月亮营地》中的阿·格旺、阿·吉、甲桑所作出的选择，既是他们在焦虑与痛苦中的寻求，同时也是他们对自我的认同与对未来的憧憬。

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创造自己本质的积极性，主动地去选择做什么样的人，自由地选择走什么样的路。人的本质就是自由，一切取决于人身如何行动。1956年萨特在《禁闭》的语录前言中曾指出：“我通过这个荒诞的戏表明我们争取自由是多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我们生活的地狱是如何地禁锢我们，我想我们有权利砸碎它。”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谋划，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改变自己形象的一生。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也享有充分的自由。萨特认为，懦夫是自己造成的懦夫，英雄是自己造成的英雄。这说明一切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阐释人的本身。

在《北方的河》里，通过“他”渡黄河与黄河的搏斗，强调了人生的价值要靠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这一主题。显然，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

造性，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由的选择和创造。大大优越于那种消极被动怠惰等待的处世哲学。“自由选择”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等小说写出了人们对自身生存方式的选择，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眼光去看社会，以自己的头脑去思索社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选择人生，他们相信自己超过相信任何其它人，同时，他们也尊重别人的选择。贯穿《北方的河》的是冈林信康的歌：“我就是我，我不能变成你，就连你在那儿独自奋斗，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小说中的“他”和“那个姑娘”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虽然爱情曾在他们心中萌过芽，最后却由于不同的选择而被扼杀，但他们依然相互尊重彼此的选择。同样，对于他的女朋友海涛，虽然海涛为了回城而背叛了爱情，人们都觉得是海涛抛弃了他，而他依然那么冷静的把她送走。他尊重海涛的选择，也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大家都在重新选择生活。我和华北、二宝、颜林，还有“她”都在重新选择生活。

《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在最初可能不明白索米娅的选择，拼命地为索米娅所受的遭遇复仇，而索米娅却选择了安静的生活下去，最后当他看到索米娅现在的生活时才悟出了每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存在主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具体到人类的生存来附比，也就意味着生活是根本性的，它决定着本质，“首先人存在，露面、出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2]所以应该正视人生，拥抱生活的全部，连同它的缺憾。《黑骏马》中的索米娅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当她扑在情人怀抱里，也品尝到了爱情的甜蜜，觉得人世间的一切都像朝霞般的美丽，可当她遭受了希拉的奸污而怀孕时，她又那样地服从于命运，向屈辱低头，竭力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她和老奶奶一样，明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个存在——善与恶，同时并存，她们以宽容的胸怀容忍了命运给予她们的一切，而索米娅艰难把小女孩生下来，也许因为她在赋予一个新生命生存的权利的过程中，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同时，存在主义都认为，自我选择与“焦虑”相伴随的，当一个人有所行动

时，他充分地知道他不只是选择他所意愿，他在做出选择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别人的选择。白音宝力格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离开了索米娅，在做出选择时，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绝望和伤心笼罩了他。“正是在焦虑中，人获得了他的自由意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说，焦虑是自由这存在着意识的存在方式，正是在焦虑中自由在其存在里对自身提出问题。”^[3]存在主义哲学认为这是人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最重要方式，尽管这种选择后果不知是福是祸，而且人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但在荒诞世界中坚持自由选择，却是高尚的。它使人进入了真正的存在，使人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简言之，存在即自我，存在即荒诞，存在即死亡，存在即自由。

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兰幽幽的峡谷》、《成长》、《小镇上的汉子》、《拔草女人》等小说完全是对主人公心理一种情绪和感觉的表述。在邪恶面前牧民扎拉嘎选择的是怯懦与妥协，作品弥漫着一种衰怨、忧伤、惆怅的气息。这是作者对现实的焦虑与失望，对在金钱、物欲面前表现出来的人性的贪婪，堕落的愤怒，或是对人际关系中尔虞我诈、世态炎凉的抱怨与落寞，这与存在主义的对世界的悲观、荒谬、苦闷以及人生的孤寂等情绪是一脉相承的。

而另一位蒙古族作家敖·奇达那日的长篇《遥远的腾格里》，其小说表面上叙述的是活佛桑布葛根的爱情故事，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作品中的“爱情”与“性”只是一个装饰，重要的是作品表现了一种在光脑袋、念珠、袈裟、佛事活动的庄严肃穆，以及一直作为背景出现的金碧辉煌的穆吉郎寺和从那里传出的震慑人心的古刹钟声等这一切现实的“存在”带给处于不断困惑与矛盾中的主人公——桑布葛根的巨大统摄力。他的灵魂煎熬在叛逆与皈依之间，难以作出选择，这个艰难的心灵跋涉过程是主人公对自己灵魂进行拷问的过程，也是对理想所作的反思和追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终于有了自己的选择——对世俗的不屑而强调精神意识穿透了故事的表层，主人公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与归宿。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只能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因而人为了摆脱荒诞的生存状况，就要对现实进行自由选择，使自我与世界发生关系，

从而使个体生命获得价值、意义和尊严。“自由选择”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许多小说,如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去拉萨的路上》、《风马之耀》、《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梅卓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敖·奇达那日的《遥远的腾格里》,白雪林的《兰幽幽的峡谷》、《成长》、《拔草女人》以及彝族作家巴久乌嘎的《梦幻星辰》、《狐臭》等等都写出了人对生存方式的选择。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可以作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4]很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的小说创作中,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对孤独个体存在的荒诞性揭露、对那种根本的虚无与焦虑的体验以及对人的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的探讨等都与存在主义不谋而合。

二、生命的孤独与对死亡的超越

将个人放在与社会和历史对立地位的存在主义哲学充满了深深的孤独感(loneliness)。存在主义哲学在强调人的存在是一切其它存在的根源的同时,也强调人是在被抛弃到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来的,是被遗弃的。人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人在荒诞社会中是个“脆弱的东西,淹没在无限的大千世界里,孤立软弱,每一个瞬间,虚无都在袭击他”^[5]这一哲学观点在存在主义作品中均有形象的描绘。如萨特的《恶心》塑造了在苦闷的世界底层窒息的悲观厌世的孤独者洛根丁;加缪的《局外人》刻划了在荒诞世界中极端孤独冷漠的局外人莫尔索等。表现现代人的孤独感,这一哲学观点在年轻一代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中也有所渗透和表现。

对于彝族作家巴久乌嘎、阿蕾、时长日黑,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意西泽仁、色波而言,孤独就是死亡,他们忍受不了生活中的无希望、无信仰、无真理、无意义。他们在痛苦而孤寂的灵魂拷问里,试图找到人生的答案与构筑自

己理想的精神家园，他们在对民族的神话、历史、语言以及文化智慧、生命体验等元素的解构（deconstruct）和重建中试图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关于这一点，相对来说回族作家张承志理解更为深刻，他认为孤独不是一种单独的状态，它吞噬了现实的一切，压倒了一切。他笔下的不少主人公都懂得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上，他们和许多人一样，生活在孤寂中，需要友爱，需要伴侣，需要理想。

《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原以为自己早已溶入了这片茫茫大草原，早已溶入这个游牧的民族。然而，在对待索米娅怀孕这件事的态度却使他发现了他自己与那里的差异。“我想喊她一声‘奶奶’，但是喊不出来，她那样隔膜地看着我，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一种真正可怕的念头破天荒地出现了，我突然想到自己原来并不是这老人亲生的骨肉”。^[6]他与其他人之间就这样的隔膜开了，我们暂且不管这里由于传统还是民族文化的原因。同样，《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我们一直可以将他看成是一个孤独的骑士，在文中，他没有和别人的交流，死死的封闭着自己，拒绝着别人，甚至爱情。通过对这些孤独和苦难灵魂的展示，表现了作者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成功并不能真正给人的生活带来改变，包括不能改变人心的孤寂。同样张承志在《心灵史》中，表现伊斯兰的黄土高原，正是一堆令人魂牵梦绕的土地和精神家园，一个孤独的灵魂在这里盘旋，他在生命的感悟中，历尽艰辛，试图揭开厚厚的尘封的历史，寻找到民族的魂灵与永不熄灭的民族“心火”，体现了作者一种坚韧、孤独、庄严与自尊的民族情怀。

张承志先后创作的小说《湟水无声地流》、《残月》、《九座宫殿》、《终旅》、《黑骏马》、《北方的河》和《心灵史》中都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张承志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痛苦回忆与反思以及大灾难过后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荒谬，孤独感、异化和失落，使他在存在主义思想中找到了心灵的契合点，并由此而产生共鸣。从张承志笔下不少人物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整个人类的身影：我们不知从何处、不由自己选择地来到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是美丽而聪慧的万物的灵长，但我们不知道自己身

上的“原罪”，我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努力追寻，便可以摆脱隔绝和孤独，从而获得拯救。可是，自从人类始祖被放逐出伊甸园起，人类便迷失了回家的路，无家可归的孤独是每个人天定的宿命，根本无法逃离、无法穿越。失落精神家园的无根感、孤独感，是人类从古到今的共同感受。“何处是我家园”是每个人都在面临的给不出答案的疑问，也是张承志严肃的生命质询。

对死亡意识的追寻是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所努力表现的另一话题。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死亡是孤独人摆脱荒诞处境，寻求自我价值的一种选择。死是存在哲学中描述的此在三种基本状况之一，海德格尔把“此在”称为“走向死亡的存在”。他认为正是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意识使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死亡对于存在有着最为本真的意义。就存在的整体性而言存在应是面向“死亡”的存在。为了解开荒诞世界中人的生存之谜，对死亡描写和死亡意识的追寻，已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存在主义小说这种对人的生命之谜，对人的生命的自生自灭，特别是死亡之谜的追寻，实际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对人生现实、对远古文化追寻后的更进一步思索。

存在主义者都认识到死亡的可能，但西方存在主义者认为死是某种行将到来的可能性，即“不再在此”的可能性，死对存在有一种紧迫性，他们把生和死截然分开了。而在张承志那里，存在主义和老庄哲学结合起来了，他的“死亡”具有一种重归母体的渴求。

在另一位回族作家石舒清的小说中也表现了这一点，越是古老的生命，越是隐藏着令人怦然心动的生存秘密。在他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中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就是为马子善老人一家服役一辈子的老牛在死亡面前的从容自若。老牛是马子善老人生命的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显示了生命的另外一种展开方式。作为一种象征之物，老牛代表着这片古老又粗砺的土地和在土地上先验存在的信仰本身，它以自身的牺牲来承担起救赎的重负，以牺牲个体来感应一个冥冥中的神谕，并最终献祭于信仰中。文中这样描写看到属于自己的那把“刀子”之后的老牛：

牛宁静端庄地站在那里，像一个穿越了时空明澈了一切的老人。它依然在不缓不疾，津津有味地反刍着，它平静淡泊的目光像是看见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无意看。

死亡，在《清水里的刀子》中成为一切生命形式的最终归宿，也是生命最高价值的评判。老牛用一种雕塑般凝固的姿态静观着外部世界，从容而又恬淡，以永恒的反刍迎接着生命中的召唤。它的世界是一个自足的内在世界，人无法介入也无法渗透。

可以说，死亡意识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死亡，而且要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是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色波；回族作家张承志；彝族作家苏晓星、时长日黑；苗族作家向本贵、石定、第代作冬；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满都麦、敖·奇达那日；土家族作家苦金、陈川、蔡测海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话题。然而，在那荒谬、灰暗、恐怖的世界里，死亡一方面以其猝不及防的力量使人感到神秘可怖，一方面又被人当作逃避虚无、摆脱荒谬人生的最终手段。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具体存在，也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在他看来，人只有面临死亡时，才能最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死亡就是非存在，就是虚无。面临死亡，就是由存在转向非存在，对死亡的恐惧就是拿存在与非存在作比较。甚至有的存在主义者认为“死亡是最高存在，也是最高的认识和最高的道德。由此可见，当代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与存在主义者在死亡意识上，确乎若有夙契。

藏族作家阿来在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表现了这种悲剧与死亡。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是藏族土司辖区罂粟的引进、贸易的引进、梅毒的引进以及汉人的进入，并夹杂野蛮的战争和杀戮。而在罂粟引进之前，土司辖区处于一种原生态的平衡之中，有它自己的独特秩序和维持秩序的独特机制。但这一切都在罂粟引进之后，变得一去不复返。土司制度最终无可挽回地崩溃，像尘埃那样悄然落定——最终走向了死亡，成为了一种非存在。

苗族作家第代作冬在处理“死亡”这一主题时，往往具有典型现代化的死亡特色（他与我们曾多次谈到他作品中的这一问题）。在他的小说《走马》、

《浮出梦境》、《草海》、《灰色雀鹰》中，作者为了排除意识中的孤独和虚无的幽灵，只有借助于死亡。因为他缺乏自身的内在能力去征服虚无和孤独，为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价值而痛苦，所以，为了领悟到自身的存在，解脱内心的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果断地、心甘情愿地选择死亡。第代作冬的不少作品都体现了一种深切的死亡意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只有死才排除任何偶然和暂时的抉择，只有自由地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目标”。^[7]因此，选择死亡，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虚无，它逼促着个体生命作出真正必要的创造，将有限的人生转化为“无时间的本质形式”的价值人生。——正是基于这一哲学思考，第代作冬笔下的人物在死亡面前才体现出一种超然而从容的特征。

总之，中国当代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在其创作中，已经融入了他们本人力图通过“死亡”来震醒人的价值意识的主体意向和对生存本质的严肃的哲学思考。在他们看来，正是死的胁迫，将生命从麻木的沉沦中唤醒，并驱策它投入最后的升华，只有在死亡的时刻，生之大门才会敞开它生命的全部现实的可能。

三、对悲剧的重新发现与对现实的彻底否定

存在主义重新认识和发展了西方的悲剧观，从悲剧意识来看，存在主义是以对荒诞和丑恶的描写来寻求审美的满足，以对丑和恶的暴露来达到对真的追求。因而它承袭了传统悲剧的暴露意识，充分发挥了悲剧暴露的功能，并且它拓展了暴露的范围，不仅暴露了人类、文化的困境，也暴露人自身的弱点、人性的丑陋、人的精神世界的危机、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绝望。它改变了暴露的对象，从自然界的威胁转到社会内部的危机，再转到人类面临的文化、精神、意识的各种困境。从描写高贵者转到描写平凡者、渺小者、甚至荒诞者、变态者和异化人。它加深了暴露的深度，从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转到社会悲剧、人的精神异化、心理变态，把描写的焦点集中到人物内心深处的各个层面：恐怖、孤独、冷漠、麻木、癫狂、悲观、绝望……凡笔力所到之处，暴露得淋漓

尽致，撼动了自谓物质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大厦，引起西方世界精神领域的骚动，而且存在主义把悲剧意识的这种暴露功能发挥到了极端。

存在主义认为现代社会在全面异化，“在这之中，人感到自己是分裂化的。他从自身中离异出来，他不能体验自身是自身的核心，他不是自己行动的主导者——倒是他的行动和后果成为他的支配者，人要服从它。分裂化的人找不到自我，恰如他也找不到他人一样”。^[8]他们感到世界不可知，人不可知，连自身也不可知，因而认为，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认识和感受的基点唯非理性而不能为，所以他们热衷于描写人类生存的病态发展和精神异化：战争创伤、变态心理、悲观绝望情绪、虚无主义思想等等。

存在主义还形成了当今世纪悲剧精神的主潮——“忧患意识”。就“忧患”本身来说，这需要直面人生的勇气，也需要对人生的热爱，这是作为传统意义的生命意识的折光反射。作为忧患者，他们对世界和人生遥遥不可知。可是，他们对此的态度既不超然，也不回避和粉饰现实，而是十分痛苦又十分完全地把这种忧患传达于人，以实现他们的责任，这就是忧患者沉重的使命意识。

存在主义还将传统悲剧暴露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推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因而有人说，西方人在悲剧的矛盾冲突面前，用振荡和摧毁创造了新文化。可见，其深刻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忧患意识”本身，其蕴含的人道精神已变为一股暗藏的激情和痛苦的抉择而积蓄着非凡的生命之力。正如加缪在《局外人》序中所写道的：“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一种绝对和真实的激情。”^[9]也如萨特所言：“存在主义者坦诚地说：人是痛苦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10]萨特以人为中心，号召人们在无法改变的情境下，通过自由选择不断创造自己的存在，承担自由的重负，对自己、对整个世界承担责任。

经历“文革”后，年轻一代理想的失落所导致精神的迷惘，对愚昧、荒谬与死亡的体认，使得回族的张承志，藏族的扎西达娃、阿来，蒙古族的郭雪波、

满都麦、阿云嘎，苗族的向本贵、石定、第代作冬、赵朝龙，土家族作家苦金、蔡测海、陈川、阿多，壮族的凡一平、李冯，佤佬族的鬼子等人毅然抛弃了对温情的眷恋。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似乎剥去了新社会、新时代给我们的世界缀饰上的五彩光环，还原给读者一个充满悲剧与荒芜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小说的确具有存在主义小说的一些典型特征，形象地表达了他们对荒谬社会与悲剧现实的体认，而这恰恰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们并没有回避对社会的责任，对生活他们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

这一点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得到了十分典型地表现。人们也许可以选取多种多样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去解读他的长篇小说《金牧场》与《心灵史》，但在这里，我们却只想用悲剧意识的体现与生命的沉入来接近它。因为悲剧意识与沉入生命是张承志体验人生的主要方式，也是他逼近艺术的主要手段。透过小说文本的表层，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对现实的否定与绝望中，试图在自己作品里完成他对理想的述说与救赎，这是存在主义“悲剧意识”的鲜明体现，其暗藏的激情和痛苦的抉择而积蓄着非凡的生命之力在作品中的鲜明体现。

而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在一种表面的静默中蕴藏了一种抗争的激情，是一种在感性边缘上挣扎和颤动，进入了对人类某些根本境遇的洞察。作者在作品中对现存的不合理现象、对人的生存境况以及人生的某种悲剧性激起他高度的敏感。透过文本我们可以体悟到人生终是荒谬的、痛苦的、不和谐的，这个世界本质上的荒谬决定了人生必然的痛苦。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上的基本状态是：悲观、烦恼、恐惧、焦虑。宣称这世界是一种异己力量，人在这世界上是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人虽然力图摆脱这种现实，选择未来，但一切选择都无济于事，只有“死亡”才是不可避免的，才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作品恰恰暗合了存在主义这种对现实无比绝望的情绪。小说中的主人公塔贝是一个忧郁的人，也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忧郁的间接折射。他总是显得格外地孤独，又仿佛被一种深切的痛苦所压迫着，他那种孤独中的苍凉和痛楚是所有的时间都无法磨蚀去的。正像存在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人在这世界上是可以选择未来的，对未来是可

以充满希冀与梦想的，……但是最终人将无力选择，无家可归，一切都无济于事。所以塔贝为去寻找那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到的香巴拉，于是他矢志不渝，一个人向前走，一直走到“喀隆雪山”，走到传说中的莲花生掌纹地带，迷失在时间隧道里，消融在神秘的巨大永恒中。塔贝似乎找到了什么，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

扎西达娃曾说：“去吧，我命令自己，去没有脚印的地方，开拓自己的领地。”^[11]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力图证明，藏民族虽因历史的原因而重负缠身，但他们并不是永远的沉沦者，当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到沉重所带来的人性悲哀时，他们便会为摆脱这个重负而竭尽全力。

回族作家石舒清对人类因自己的精神努力与宇宙意识之间所构成的巨大悬殊而激发出来的悲剧精神投入了极大的虔诚，他笔下的人物马子善（《清水里的刀子》）总是在苦闷地寻求，在生与死的思考里，他认识了人生的真谛，时间是永恒无情的，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最终都得走向死亡。他站在坟场与尘世之交的生死之门去作关于生死意蕴的哲学叩问。

马子善老人具有冥思者的一切特征：忧伤、孤独、充满梦一般的回忆和对当下一切的怀疑。老人的每一步思索都笼罩着现实与生命的双重焦虑，是继续在这个已经失去眷恋的世界上浑浑噩噩地活着，还是听从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天国的召唤，在前所未有的人生苍凉晚景中，老人陷入了挣脱不开的焦虑，这是一种很沉重、很宏大的焦虑感，带有悲凉的底色，而又无法说清的因果。

老人仿佛置身在一种命定的循环中无从解脱，这种无从解脱之感在老人这里已不单是对于生命变化的困惑，更是对未来生命流向的无从把握，存留与抛弃，已知与未知，人生的有限和终极目的无限，这些深刻的疑问都无时不在拷打着老人空茫的心灵，冥思者的思索本身就是寻求。强调人物——特别是小人物生存的困境，和在各种困境中挣扎的人物的生存命运，一次比一次沉痛的生命控诉使我们深切的感到了现实的凝重。

如前所述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世界里，不难发现那一个个充满着死亡与异己的世界，死亡是荒谬世界最本质的体现，人必须在冷酷荒诞的世

界上承担自己的命运。现实是荒诞的，人生充满了悲剧性，在这个荒谬、虚无的世界里，人首先必须学会如何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承志、扎西达娃、鬼子、石舒清等人他们对“死亡”母题发掘与高扬，对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对悲剧的发现与对现实的否定都是他们对生命深刻体悟的结果。

总体看来，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并不是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自觉地去接受西方的存在主义思潮，但在他们的人生体验中却完全可能不自觉地与这种思潮产生某种精神暗合。在他们的小说文本背后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或蕴藏着存在主义的哲学思绪。当然，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种种的不合理毕竟与萨特所面对的不同，所以他们即使对苦难的现实与沉重的历史予以深切的思考和批判，却并不表现为一种尖锐的对抗，而是体现为一种关注与忧患，对历史和现实的承受、理解甚至超越。

(该文为[韩国]梨花女子大學中文系·清音李鍾振教授定年紀念献礼)

参考文献

- [1] 参见冠才军《由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创作看当今藏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 [2][4]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第29页。
- [3]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 [5] 萨特语，转引自：《评法国现代派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 [6] 张承志《黑骏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 [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6页。
- [8] 转引自：王秋荣、陈伯通主编《西方文学思潮概观》，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381页。
- [9][10] 《外国文学》1986年第10期，78页。
- [11] 转引自：卓玛《走出“阴影”——谈扎西达娃〈风马之耀〉中人性的复苏》，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4期。

<Abstract>

Loneliness in the Perplexity and Salvage in the Selection
— On the Existentialism's Influence upon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Minority Novels

Qiu, Yan · Tu, Hong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ichuan Chengdu, 610041)

Existentialism is an ideological tend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hat occurred in we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has a deeply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on society. Since the 1980's, due to the deep and acute society's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Chinese contemporary minority authors have been influenced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y the ideological tend in the tenacious and rebelling selection. Standing on modern civilization's ruins, they follow the road of the topic of the ancient people's existence and try to salvage themselves from the dilemma caused by civilization in the eye of spirit. They endeavor to pursue and construct human's life. The exploration on reality, existence and selves which make them to be caught in the perplexity of not being recognize themselves and not being control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y try their best to show the absurdity and tragedy of life, and deny the loftiness of mankind's existence by way of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y reflect, realization and establish the real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art.

Key Words : Chinese contemporary period, minority novel, existentialism

투 고 일 : 2012. 1. 10. / 심 사 일 : 2012. 1. 10. ~ 2012.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2. 17.